

新书解读

《大宋帝国三百年：赵匡胤时间》以正史为基础，以野史和民间传说为作料，对赵匡胤五十余年的历史故实进行了全景再现。以下是本报记者与作者关于本书的对话——

赵匡胤的时间去哪儿了

□ 本报记者 逢春盼



无《太祖誓碑》，则无大宋“文明时势”

本报记者(以下简称记): 王夫之评价赵匡胤说:“太祖勒石, 锁置殿中, 使嗣君即位, 入而跪读。其戒有三: 一、保全柴氏子孙; 二、不杀士大夫; 三、不加农田之赋。呜呼! 若此三者, 不谓之盛德也不能。”您怎么看“太祖勒石”?

金钢(以下简称金): 赵匡胤不是没有错误甚至罪恶的人物, 但他有千错万错, 却有一项亘古未见之德政, 令大宋在本质上脱离了五代乃至历史上的种种野蛮军政, 进入了文明世界, 为中国历史提供了了不起的政治和思想的“增量贡献”, 给大宋带来了恒久的光荣。这就是《太祖誓碑》。

大宋立国, 非贵族上位(这方面与大汉很像), 但它依然造就了前所未有的政治文明。我倾向于认为: 时势造英雄, 但英雄也造时势。大宋的“文明时势”, 即由赵匡胤“英雄人物”所造就, 其中至大之功, 是“誓碑”。没有“誓碑”, 就没有大宋320年的“文明时势”; 就像没有杰斐逊, 没有《独立宣言》, 就没有美国的大格局一样。制度之建构, 源于种种合力, 在很多历史时刻, 是圣人、大贤、智者、英雄个人的作为, 推动了制度的建构。

记: 为何“保全柴氏子孙”?

金: 因为柴氏“无罪”, 老赵得到的大宋乃是由“逊周”而来。但历史上那么多杀戮前朝元首, 以便斩草除根的故事, 老赵为何不去做? 此即去往日戾气, 养天下和气。老赵有“天下目标”。他听闻、看到、亲历的梁唐晋汉周, 戾气太深重了。培育国脉, 养成一点祥和之气, “胜残去杀”, 须有“英雄手段”。这是真的“强者”的“宽容”。

记: 为何“不杀士大夫和上书言事人”?

金: 老赵应该记得周世宗柴荣曾经下过《求言诏》。正是因为这一篇《求言诏》, 引来了名臣王朴的《平边策》。昔日即使尧舜禹汤这样的“上圣之君”, 文武成康这样的“至明之主”, 都在求逆耳之言, 苦口之药, 何况不及他们的人呢? 士大夫, 是国之精英, 是读书的做官人, 或做官的读书人。“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”, 是大宋“天下为公”的基本职官结构。大宋不是为了独夫利益治国, 不是为了部落利益治国, 不是为了政权利益治国, 而是为了全面共同体而治国。这样就需要士大夫也即邦国精英的深度介入。这样, 就为帝制时代提供了最好的言论自由空间, 为“君相博弈”的军政活动预先假设了两道并行的逻辑:

- 1. 君王必须自省, 在羞耻心的作用下, 尽力做到“防非窒欲”。
- 2. 臣下则应该培育忠信之正, 做到“忠信醇厚”。

这就是“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”的前提——“君臣交敬”。有此“君臣交敬”, 而后可以“君臣共治”。“共治”之际, 士大夫在“忠信醇厚”品质之后, 最需要提供的就是军政智慧; 帝王在“防非窒欲”品质之后, 最需要提供的就是决断方向。但如果不能做到“君臣交敬”, 士大夫则无能到“忠信”, 也就不大可能提供有益于邦国的军政智慧; 帝王如果无能做到虚怀纳言, 也就不大可能为国家运转提供正确的决断方向。士大夫的军政智慧, 则主要由“上言”而体现。士大夫的“上言”是帝王战略决断的重要依据。阻断了士大夫“上言”, 帝王的决断也就成了独断。

《太祖誓碑》在大宋具有大法、宪章性质, 虽然不是成文法, 是“秘法”, 但此事够得上伟大。“言事人”于千年之前就实现了“免于恐惧的权利”。老赵立国伊始即承诺于“天下为公”理念, 奠定当时世界范围内罕见的政治格局, 是大宋帝国也是中国传统的极大光荣。后来的大宋名臣范仲淹有言:“祖宗(太祖太宗)以来, 未尝轻杀一臣下, 此盛德之事!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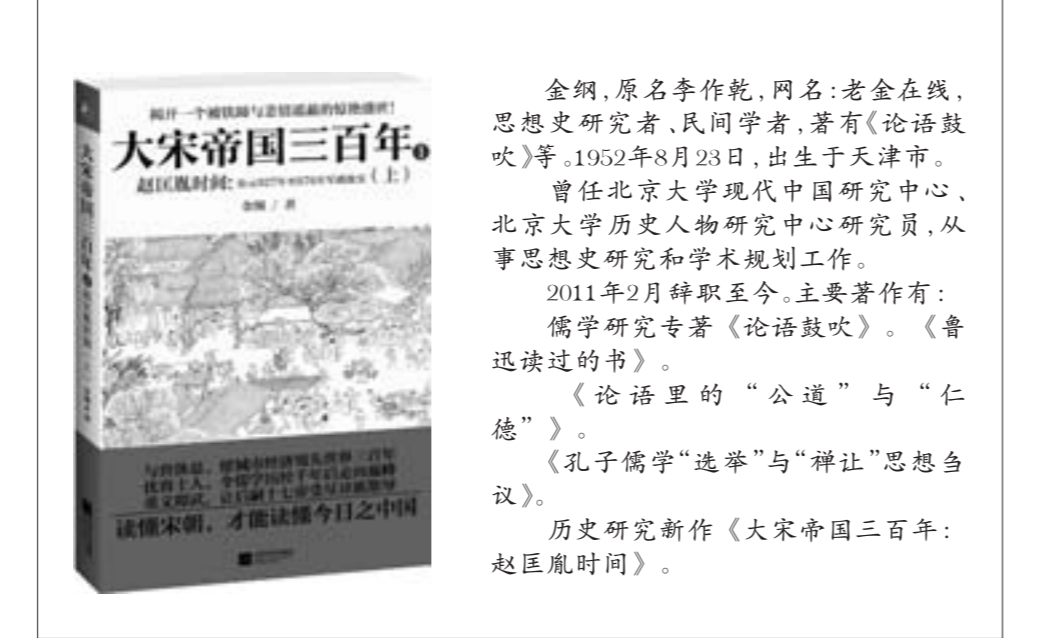
记: 为何“不加农田之赋”?

金: 此事关系民生。老赵宁肯官禁生活节俭, 也不苛求民间财富。传统帝王“以天下奉一人”, 这个活儿, 老赵不干。他的节俭深得中庸之道, 他不刻意节俭以邀名, 他非常喜欢宫中宴饮, 经常与臣下、亲族、异邦使者觥筹交错, 但他不会奢侈无度, 就是因为他知道民生多艰。

大宋王朝三百年, 无论遇到怎样的家国困难, 也不向农民“加赋”。后晋皇帝石重贵可以打着“抗击契丹”的旗号, 在土庶之间“括率”, 也即搜刮财货, 马楚、南汉也会这么做, 甚至南唐也曾有过此类举动, 但老赵不这么做。他不会在崇高的国家目标旗帜下搜敛民财。

传统儒者在推演政治、伦理价值时, 必是“民生主义”者。反暴敛、惜民力, 主张轻徭薄赋, 是传统儒者恒定主题。此义近于捍卫私有财产权利。中国传统圣贤人物, 无一例外, 都是注重民生的人物。孙文曾言:“民生就是政治的中心, 就是经济的中心和种种历史活动的中心。”(见《孙中山选集》)由此也可以概见: 那些以国家“大义”为诉求, 借机搜刮土庶、背离土庶“民生”的权力, 都是非文明政治生态的无道行径。有道邦国、无道邦国, 是否尊重“民生”, 是否在“大义”旗帜下背弃“民生”, 分野在此。

不仅“不加赋”, 赵匡胤做得漂亮的, 更多是不与民争利。除了几个较大企业收归国有算作央企之外, 一般都让与民间自营, 连“赋



金钢,原名李作乾,网名:老金在线, 思想史研究者、民间学者,著有《论语鼓吹》等。1952年8月23日出生于天津市。曾任北京大学现代中国研究中心、北京大学历史人物研究中心研究员,从事思想史研究和学术规划工作。2011年2月辞职至今。主要著作有:《鲁迅读过的书》。

《论语里的“公道”与“仁德”》。《孔子儒学“选举”与“禅让”思想刍议》。

历史研究新作《大宋帝国三百年：赵匡胤时间》。

宋代赋税沿唐中期以来两税制, 即夏、秋二税。赵匡胤时代, 令州县各置义仓, 官方所收二税, 每一石粮, 另外留出一斗贮存在这个义仓里, 史称“以备凶凶”。等于国家收税, 另外返还百分之十留在地方, 以凶凶年荒年赈济百姓。这类德政, 甚至超过了“不加赋”。

老赵晚年, 特别在意地方治理, 有一次, 他任命官员钱文敏知泸州, 召见他, 对他说:“泸州那个地方接近蛮獠, 但越是这样, 越要加以抚爱。我听说原来的知州郭思齐、监军郭重进, 擅自搜敛做不法时, 爱卿你此去为我调查审问一下这个事, 苟有一毫侵民, 朕必不赦!”

在此之前多年, 赵匡胤也说过类似的话。乾德四年八月, 赵匡胤召宰相以下群官多人, 在紫云楼下宴饮, 顺便说到“民事”。赵匡胤对赵普等人说:“下愚之民, 虽不分菽粟, 如藩侯不为抚养, 务行苛刻, 朕断不容之。”

居于弱野的庶民, 即使愚蠢到不分菽粟, 但如果藩镇的侯爷们不好好抚养, 只知道苛刻盘剥, 朕断不容这样事!

《太祖誓碑》是老赵“立德立功立言”之举。

深得“保守主义”奥妙的政治家

记: 乾德二年(964)春正月丁未, 赵匡胤下了一道诏书, 规定:“县令、县簿、县尉, 非公事不得到村落。”这是传统“皇权不下县”的“旧贯”。民间如何“发展”, 由民间自行演绎。这种源于保守主义精神、源于儒学“仍旧贯”的智慧, 成就了大宋的繁荣。是不是宋太祖受黄老哲学“无为而治”的影响?

金: 赵匡胤是“无为而治”的一代圣君。“无为而治”一般被认为属于道家哲学, 事实上, 这是儒学最重要的思想。在《老子》中, 找不到“无为而治”的完整表述, 但这四个字则完整记录在《论语·卫灵公》中: 子曰:“无为而治者, 其舜也与? 夫何为哉? 恭己正南面而已矣。”

孔子说:“邦国治理达到无为而治境界的, 大概只有舜吧! 他做了些什么呢? 只不过是恭恭正正地坐在位子上而已。”

这里涉及到老子在前还是老子在后的问题。钱穆主张孔子在老子之前, 我同意这个看法。钱穆对“无为而治”的发明权解释:“孔子屡称尧、舜之治, 又屡称其无为, 其后庄、老承儒家义而推之益远。其言无为, 与儒家自不同, 不得谓《论语》言无为乃承之老子。”这话略过不提。

行调节、社会自我完善的格局, 也就是在向“无为而治”趋近。对百姓的干预越少, 政府计划行为越少, 也就越是接近于“无为而治”。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体制, 在很大程度上就是“无为而治”。“恭己正南面”的执政, 看似“无能”, 但却是共同体的幸运。那些好大喜功, 不断需要“政绩”来自我鼓舞的执政, 反而可能给共同体带来不幸。人民, 是可以自治的。

达致“无为而治”这个境界或结果, 要有许多条件, 在儒学看来, 有两个条件不可或缺, 一个是执政的道德境界, 一个是庶民百姓的道德境界; 在儒学的逻辑中, 前一个条件, 又是第二个条件的条件。这个意思是说: 共同体间的文明程度的提高, 是实现“无为而治”的先决条件; 但这个文明程度, 必有赖于执政者的文明程度的率先提高。《论语》中已经反复陈说了这个理念。《大学》中, 将这两个条件概括为“絮矩之道”, “絮”的意思是绳索, 用绳来度量; “矩”是尺子, 用尺子来度量, “絮矩之道”, 就是度量之道, 是说话行要有规矩, 要有垂范作用。但是自己首先要正确, 否则, 度量的对象就是不正确的。《大学》中的这个意见, 更是不断出现在各种儒学著作中, 从《孟子》、《荀子》一直到现代儒学。因此, 这是一个特别值得重视的思想。

当孔子说出“无为而治”的时候, 他是相信人的道德能力的。他认为人可以实现强权治理以外的模式。大宋的“天下目标”不是“发展”而是“太平”。一般来说, 由官方主导的“发展”程序会出现种种政策倾斜。即使制定政策者皆为圣贤都难免出错, 官方的圣贤与民间的圣贤一样, 都是理性有限的物种, 在“发展”的政策倾斜中, 如果杂入“寻租”活动(一般来说, 是一定会杂入的), “发展”就成为官方的牟利借口。自发秩序原理, 发展与否, 是民间根据“看不见的手”自我推演的程序。官方无须倡导。因为官方不一定知道哪些该发展哪些不该发展, 老赵也不例外。他即使身为“圣君”也不可能保证国家的发展可以按照他的意愿愿景渐次展开。传统儒学基本上不讨论“发展”问题, 道理在此。

老赵不致力于“发展”, 将天下目标简洁地锁定为“太平”, 一切皆由民间自发地去推演。所以, 乾德二年(964)春正月丁未, 老赵下了那道诏书, 成就了大宋的繁荣。大宋经由太祖、太宗、真宗、仁宗、英宗, 五朝皇帝百年, 基本上奉行一个“简”字。君王们看到天下有不足, 自省中反求诸己, 故天下安定。船山称:“得失之枢, 治乱之纽, 斯民生死之机, 风俗淳浇之原, 至简也。知其简, 可以为天下王。”军政得失的枢机、国家治乱的枢纽, 万民生死的钥匙, 风俗好坏的本源, 其道, 都是至为简洁的。知道这种简洁, 可以使天下达致王道。而那些不懂“简”, 总试图有所兴作, 并打着儒者的旗帜, 其实是泛滥于法家做法, 距离儒学远甚。老赵是传统中国深得“保守主义”奥妙的政治家。

现代社会, 受激进思潮影响, 人们对这类“保守主义”多不理解, 以为“改天换日”之

类才是“英雄手段”。这是造就世相浮躁最重要的动因之一。经验传统, 是人类积年沉淀的习惯与智慧。尊重经验, 就是尊重先人, 事实上也即等义于尊重自我——因为自我也会成为未来的经验传统。那种动辄“历史从我开始”的狂妄, 给共同体演绎的苦难已经太多了。

宋太祖反求诸己, 以静制动, 在渐进过程中, 不断化解五代以来的社会戾气, 慢慢做成一个有道世界, 但他又不去顶着“自尧自舜之名, 以矜其美, 而刻责于人”。考察他的言论, 他不像唐太宗那样, 喋喋不休地讨论“仁义”。他不说沽名钓誉的话, 言出于内心之诚。考察他的事迹, 他不像汉文帝汉景帝那样, 忍人之所不能忍, 容人之所不能容, 他不用忍, 也不须容, 那些该“忍”的事, 他能泰然处置; 那些该“容”的事, 他能豁达面对; 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过程。所以赵匡胤的“宽容”并非有意“宽容”, 而是本色存在。天下的纷乱之气, 因为“我”之镇定而就绪为一种安静的秩序; 天下的瓦解之势, 因为“我”的真诚而转化为一种渐次的安定。这一切是怎么成就的? 船山说:“无他, 心之所居者本无纷歧, 而行之自简也。”

记: 由乱世, 到升平之世, 再到太平盛世, 是传统圣贤期望中的风景。

金: 孔子说:“善人为邦百年, 可以胜残去杀。”这话与孟子“不嗜杀人者能一天下”说, 都预示了由“敬畏生命”为逻辑起点的政治伦理正价值。儒学对这类价值有连续性的推崇和不衰的敬意。

船山说, “胜残去杀”, 这话有人认为是文景之治可以当之, 其实不是的。文、景所为, 是老庄道家的支流, 还不是孔子所论的境界, 如果说有谁能当得起这个境界, 那就是宋太祖赵匡胤——“太祖其庶几矣”!

着眼当代, “以史证经”

记: 有人评价说, 你写的《〈论语〉鼓吹》至少有三个递进的层级: 第一层级: 圣贤的本意和潜台词是什么, 这个层级要回答的是所指和能指问题。理解所指, 需要推演, 理解能指, 需要考据。第二层级: 抽象。目的是要从中获得人类共同意识。圣贤思想中有许多古典式表述, 不抽象, 不足以发现其价值。第三层级: 创造性转化。这一问题与当下要求有关。在写赵匡胤时, 你也有这样的考量吗? 从原典本来意义出发, 一步步深入历史人物的可能意义和现代意义?

金: 科林伍德在讨论历史哲学时, 给出的名言是“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”; 还有一位历史哲学家阿克罗齐, 他给出的名言是:“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”。这两句话含金量极高, 展开来说需要相当篇幅。这里可以略说一。

科林伍德一向执着于“思想的行动原则”。为此, 他有一个意见说: 当我们阅读柏拉图作品的时候, 要这样来问问自己: 如果用柏拉图的词来表达自己时, 自己想的是什么? 研究者是要置身处地地想问题的。凯撒渡过了卢比孔河, 这只是一个“事件的外部方面”, 但他为什么要渡过? 是凯撒对共和国法律的藐视? 或与谋杀者信奉的宪法政策有了冲突? 这才是“事件的内部方面”, 两相结合, 就是“思想的行动原则”了(参见《历史的观念》)。现在可以看到, 这个意见, 也正是“同情的理解”, 且更进一步。他所提出的“事件的内部方面”作为一个“问题”, 其问题的设计与提出, 往往是与当代有着某种有意味的联系。这样, 就与阿克罗齐的“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”有了精神上的相通之处。

科林伍德的另一个意见是: 历史研究应该始于问题。历史学的任务在于实现对人类“人性”的自我认识。历史学家应该有问题要解决, 进入历史纵深, 不过是找到一条路径而已(也许还可以有其它路径)。如果没有问题要解决, 凯撒或柏拉图是没有意义的。人类的心灵从历史到现代, 是有脉络可循的。那么什么是问题呢? ——这就是“一千个哈姆雷特”的问题了。结合阿克罗齐的意见, 现代人应该不难在进入历史纵深时作出自己的选择吧? 事实上, 这个意见与波普尔的意见也相当接近。他认为在认识论问题上, 提出问题以及用于解决该问题的知识更有趣。他认为科学主义从问题开始, 而不是像归纳主义那样始于观察。不可能有一种像利奥波德·冯·兰克主张的那种“真正如实表现过去”的历史, 只能有对历史的解释; 而且没有一种解释是最最终的, 或以“终结的”, 每一代人都拥有权作出属于自己时代的新的解释——证诸于历史, 也正是如此。

我写作《大宋帝国三百年》, 也有“当代意识”的考量。其中比较重要的一个催动力是: 我的史学观念让我知道教科书讲述的“历史规律”, 也许并不靠谱。我需要独立思考。此外, 在我对儒学历史的研究中, 我发现历史“故实”也许是解释历史儒学的一个有趣味的方向; 而现代儒学也是言人人殊, 我有意在“当代意识”烛照下, “以史证经”, 用历史在验证儒学经典, 从中寄托属于我的“经学思想”。这就是我在全书扉页中留下那一段题记的原因: 孔子有言:“我欲载之空言, 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。”空谈大义, 不如春秋褒贬。如果愿意意见圣贤气象和道义担当, 历史叙事比思想讨论也许更切实详尽, 也更彰明昭著。

传统中至为珍贵的“圣贤气象”和“道义担当”, 对当代人而言有多么重要? 这是需要读者给出答案的问题。

新书导读



《大唐帝国东亚战记》
柯柯雨 著
山西人民出版社

该书首次还原大唐帝国征伐高丽的历史细节, 展现东亚史上最为波澜壮阔的战争场面, 新罗为何接连出了两位女王? 唐高宗真的是史书上所载的“昏懦之主”? 为什么说白江口之战日本惨败反成了最大的受益者? 该书一一做了解答。



《文明的度量》
(美) 伊恩·莫里斯 著
中信出版社

全球著名历史学家伊恩莫里斯的《文明的度量》横跨15000年的人类漫长发展史, 围绕全球文明重心的迁移, 就西方向时开始主宰世界等重大问题展开阐述, 对决定经济和社会发展趋势的诸多因素进行了定量描述。



《走自己的路, 先选对路》
威廉·尼采 著
吉林文史出版社

该书选摘自尼采著作里最具有哲理性、最发人深思的语段, 帮助我们认识和了解自己, 让我们知道面对人生挫折时如何坚定世界观的思维选择, 给人带来正能量的心理暗示, 从容地面对生活。



《无上荣耀》
(美) 康多莉扎·赖斯 著
湖南人民出版社

该书带领读者走进决定国际局势的秘密谈判室, 了解当今国际要闻背后的真相和细节。还将近距离领略布什、普京、奥巴马、布莱尔、卡扎菲、沙龙、阿拉法特等世界各国领导人的风采和趣闻, 并深切体会到美国所代表和追求的价值与治国理念。



《大地之灯》
七堇年 著
人民文学出版社

该书写出了青春的疼与痛, 花样年华的愁与怨, 更饱含深情地描述了简生与淮的一段荡气回肠的爱情传奇, 读之令人动容。